

是指事先尽量避免大的错误和卷入被研究群体的复杂事务。“声明”(Declaration)包括直接地拒绝做某事的邀请。虽然戈登(Gordon)从未拒绝讨论他对于宗教的看法,但两种方法他都能够成功地运用。

很显然,即使戈登(Gordon)不是一个准备皈依的人,这种策略使群体成员能够把戈登(Gordon)作为一个他们所尊重的人来接受。简而言之,群体成员开始在他的专业的角色的意义上来接受他,就像戈登(Gordon)所说的那样“在增强与群体成员的和谐性方面有着自相矛盾的效果。”(p.273)

结论

在很大程度上,戈登(Gordon)和我自己的研究小组的研究经验与安东尼(Anthony)(见Schwartz, 1970)所描述的研究经验是不同的。这种不同导致了以下结论:对新教群体的研究并不需要再现一种如贝拉(Bellah)所说的象征现实主义的限制性个案。实际上,一种视群体成员为正常人(当然群体成员也视研究者为一个真实的人)的公开的研究方法看来是贝拉(Bellah)的那个引起争议的概念的首选方法。并且,很讽刺地,这种能够最好地使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被赋予一种真诚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研究方法通常能够使研究者获得大量的信息。所以,这里所描述的这种较好的研究方法看来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像理查森(Richardson)等人(1978),特别是Rochford(1985)所描述的那样,更好的方法并非是没有其自身的困难的。然而,在“避难就易”和做秘密的隐蔽的研究之前,这种困难是能够和应该被克服的。

【译文选载】

田野工作中的守秘与披露

理查德·米切尔(Richard G. Mitchell, Jr)

陈玲译

导言

在20世纪80年代,我和我的社会学同僚艾林·波曼从事了两项长期的田野研究。第一项研究是对登山者——将登山作为业余爱好的人——进行的,第二项研究的是生存主义者。生存主义者预期各种可能发生的灾难——经济崩溃、种族战争、核武器袭击等——并采取措施以确保他们灾后的福利。这两个群体的公众形象迥然不同。如果我们将登山者形容为——如一个受访者所说——是“英勇无畏、热爱自由的运动员”的话,那么生存主义者的媒体形象大概是“全副武装应付世界末日的妄想狂”。这些研究给本文的主题——田野工作中的守秘与披露——提供了可做参照的例证。

第一部分主要是界定了守秘的形式,第二部分比较了实证主义者和符号互动论者视角下守秘与披露的恰当性。第三部分讨论了在与研究对象的认知和情感关系中,一种以守秘程度为基础的、



保留原有观念的研究者的角色分类。这些角色中的每一种都为领悟田野工作的方法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也提出了各自的难题。

一、情境与守秘的形式

守秘是印象整饰——我们称其为伪装——广义的过程的一个方面。伪装是改变现象使之无法被看见、被想到，它有两种：将实物对象隐藏，使之从公开的和 / 或可接近的位置被隐蔽、替代；将特定的交流情境最小化使信息保密。例如，生存主义者把他们应付危机的供给藏在偏僻的小屋、地窖或地下室里，并对除家庭成员和密友以外的人保密。

秘密可以作为应付三种剥夺的防护措施。种族中心主义者的秘密是那些假如泄漏给外人、敌人和其他陌生人，可能会招致其群体成员共同的贬损或责难、降低其在群体中地位的信息。例如，一些强烈种族主义的生存主义者组织（不是全部），在其成员中持续煽动种族仇恨时，极力将公开宣言中外显的偏见减至最少。利己主义的秘密是为人所知可能会导致其群体地位丧失的关于个人经历、本性或行为的信息。例如，登山的新手，很快就学会避免提到任何有关地产开发、伐木、采矿或其他会被保护环境的积极分子——大多数登山前辈都是——指责的工作经历。资源的秘密是那些如果泄漏给竞争者可能会导致获取资源的特权丧失的信息。一个生存主义者家庭位于荒野中的避难处，或是对登山者而言，一座未被人攀登过的大山就是这样的秘密。

二、关于守秘的争论

实证主义者的观点

在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文本中，研究者的工作被描述为从私下到公开、从守秘到披露的单向信息传递。研究者的任务是发现被研究对象守秘或保密的（或对他们来说也是未知的）东西，并且保留这些被发现的真相、事实，以启发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守秘作为这种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其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守秘就是研究者出于实践和道德原因，在话题中克服和回避一些东西。

守秘是实证主义者的枷锁。他们的方法限制了人们广泛的推理能力，也阻碍了逻辑上的从推理得出命题，即所谓的“否定后件推理”。这种命题的基础是主张所有的科学假设都可以通过关键的检验而被证伪。研究对象保留与研究无关的秘密，这是不言自明的；在调查过程中，他们的行为和态度的方方面面都必须是可察可知的，或可被控制。没有这些关键性检验的假设而采取实证主义的认识论，这既是有欠缺的也是不可能的。

与其认识论一样，实证主义者的道德声明仅仅是建立在他们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的认知维度上。研究对象被看作理性的行动者，只需要那些可根据自己的最大利益进行决策和行动的“事实”。知情的同意形式被假定为提供了这些必要的、充分的资料，并且被当作研究对象进行自由选择的客观性证据。然而，并非所有的实证主义者的秘密都被揭示了。他们在认知领域中表面上的揭密与他们在同研究对象的情感关系中频繁的有意识的口是心非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研究者接受了培训手册和导师再三的叮嘱，在进行调查时，好像他们在感情上保持了中立，好像他们对研究对象和受访者完全没有感情。对实证主义者的方法来说，这“无感情身份”的成功谎言被预设为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守秘与符号互动

理解社会学家认为，守秘在所有社会行动中都存在，但在每个社会行动中都不是完全的。守秘是无处不在的。西迈尔提到：“人们彼此间所有的交往，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即每个人对另一人的了解多于后者自愿展现给他的。”（第 455 页）但守秘也只是部分的。人们的行为是通过与他人的符号交流——既有直接的，也有在想象中预演和重温的——获得其形式和意义的，这是不言自明的（布拉默，1996/1986，第 2 页）。在这种情境下，守秘是不完全的，而只是临时的。从定义、命名和符号表述的角度来讲，完全隐秘的行动不属于社会行动的范围，因此也不在社会学的关注之内。完全零散脱节的内心事件——保留着说不清楚的思维想象中的事件；行动者没有感觉到的、完全自主的制度的不确定运动，这二者与社会学是不相干的，或者可以论证是不可能的。在这些逻辑限制的背后是实际当中的问题。

例如，生存主义者对隐匿自己的身份和倾向是矛盾的。他们意识到守秘能保护他们免受一个他们不信任的多数群体的嘲弄，但也使得他们减少了吸收成员和信息交换的机会。生存主义者也知道，在这件问题上，西迈尔或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告诉了他们什么。由于掠夺性敌人的存在因而信息和资源必须被保护的设想可帮助联合有共同目标的群体，并且提升现有的知识和财产的外在价值。在实际中，所有群体的这种安全措施成为一个双重目标的折衷结果：拒绝任何信息获得者的共鸣——这种信息可能被用于恶意目的，同时又努力将其公众形象整饰到他们可以感受到外人共鸣的程度。因此，没有什么社会行动是绝对秘密的，只是相对未知的。

“隐蔽的”生存主义者避开电话，通过书信交流过滤邮件，使用绰号和化名，向陌生人小心地隐瞒地址。有一次，我受邀参加他们的集会，发现他们很乐意与我合作。有人自愿坦白“他们的故事”，就像他们称为深入调查的那样。而羞于面对面访问的人，也出乎意料地提供了描述深入的自传和深思熟虑的文章。我打算用我的文字处理软件构思一份通讯，而后我开始接到一些成员写下的意见和感受。由于我是“生存时报”的编辑，并且随着这份通讯的名气越来越大，在群体聚会上使用录音机、照相机慢慢被接受，这给我提供了一个进入这个国家别的生存主义者群体的通行证，并且验证了务实的田野工作者的至理名言：

如果前门不开，就走后门。假如他们不喜欢台德尔·达姆，那就扮作台德尔·第去。

成功的经验社会学间建立在理解社会行动者的基础之上，也包括各种研究者，掌握他们动机、身份和行为中的守秘与披露。

三、守秘与研究者的角色

作为自我导演的产物，“研究者角色”的概念不应被过度强调。田野工作者不做声明、不作假设，不会踌躇满志地扮演这类主动词可能暗示的研究角色。符号互动论者意识到了他们在调查中扮演的角色不是绝对、完全由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可能极力用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诸如“朋友”、“客观的旁观者”或“新手”，但是研究对象可能并且通常会重新诠释、转换，或者有时候全盘拒绝这些表达。在现实中，研究者角色是与协商和活动场所的变动相适应的、临时给定的、自我的可能形式。研究者角色完全由他或她的研究对象决定，这种错误的信念仍然残留着实证主义者的盲目自大。

在研究者——研究对象关系中的认知和情感。为了理解研究者怎样被感知、被接受，强调交流中的认知和情感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是很重要的。可被证明的符合逻辑的方法都是有诱发力或精



神投入的；只有稍纵即逝的激情才是没有对象和方法的。研究对象在评价他人时使用了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人种学的调查很少由于只缺少资料而失败。更关键的是，在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的认知和情感维度不平衡时，在对共鸣的理解同共有信息大体不对称时，所发生的扭曲。这些关系包含了四种研究者角色，每一种都伴随着田野工作中的难题。

天真的共鸣角色 (The Naive-Sympathetic Role)

无论田野工作者希望扮演的角色是什么，通常情况下，最初他们都是作为“天真的共鸣者”被感知的。成员们是通过考虑这样的人能发挥多大作用开始的。假如研究者被看作是潜在的加入者，那么这些新手将接受社会化、测试、灌输思想、教导，并且通常被安排在能够增强其群体责任感的位置。这是一个理想的位置，通过它研究者可以了解内幕，但是这不是运用隐瞒身份的共鸣的唯一途径。

*难题：研究者成了牺牲品。*对那些认为他或她接受的信息是因信任而提供的——这种信任是研究对象对他或她的不断增加的信任和尊敬的回报——研究者来说，此时是危险的。对询问的一系列令人满意的回应可能麻痹调查者，使他们相信：他们同研究对象的情感关系进展神速，他们正在获得研究对象的共鸣和认可。研究对象对这种关系的看法可能不同。他们可能把研究者看作M·瓦克斯所说的牺牲品、公平游戏、傻瓜、笨蛋，研究者的群体共鸣和/或获取信息的愿望提供了轻松的方式，他们可能因为礼物、好感或其他的利益而被利用。田野工作者必须意识到，研究者表面上的合作可能是故意的、自私的结果，目的是确保研究者能提供的物品和服务的供给。

天真的非共鸣角色 (The Naive-Unsympathetic Role)

天真的非共鸣者给成员提供了可促进群体团结的参照物。这些外人常常被当作笑柄和讥讽的对象，以及其他歧视性待遇的目标，而此群体成员的观点和活动被认为是明智和恰当的。生存主义者通过将他们同“对厄运漠不关心”和“厄运神话”，诸如无法存活的“核的冬天”的主张相比较，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合理的。登山者将他们自己同非运动的“平地登陆者”和“纸上谈兵的冒险家”相区别，并且认为强过他们。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为外人是没有用的。成员们没有忽视外人的潜在影响，而是试图通过公开的自我表达来控制它，这种自我表达通过成员的位置、行动和勇气被故意戏剧化地夸张了。

*难题：避免这种戏剧性的夸张。*此时田野工作者的危险在于：避免这些交流的戏剧性方面，把它们表面价值当作研究对象世界观的不加渲染的表达。对生存主义者活动的媒体报导已部分存在着这种歪曲，媒体经常将虚假故事、对思想体系和程序的有意识的极端陈述当作生存主义者每一天的活动和观点来报导。当这些二手资料被当作分析的主要基础时，诸如科特斯（1987）在《武装的和危险的》里对生存主义者耸人听闻的描述，或是程度较轻的阿尔曼（1964）浪漫的《登山的时代》，错误就更为严重。

知情的共鸣角色 (The Informed-Sympathetic Role)

知情的共鸣者被看作是在性质上可保证群体团结的支持者。用剧院做比喻，支持者是后台的观众，自由地查看化妆和道具，和成员们同甘共苦，认可他们从事的事业的价值。支持者和成员一样向另一群体保守秘密，但在这种关系中，秘密通常是通过共同承诺而被保守的，这种共同承诺反映了公开和私密之间存在特定分界的共识。

*难题：亲密关系的悖论。*如果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情感关系发展速度快于他们对成员行为的认识的发展，此时存在着危险。获得信任的亲密被预期为理解并且真心回避某些调查线索。当这种预期是由于亲密关系（新手可能被允许偶尔失礼）而产生时，打破它是很困难的。因此亲



密关系的悖论是：在一项调查中较早获得的高度信任也许实际上剥夺了研究者观察和发问的自由。

在田野工作开始时，相对快速地获得登山前辈的认可会排除某些重要的调查线索。尽管登山者真诚地鼓励研究者询问登山的技术性问题，但是问到关于动机——“人们为何要登山”，或是任何关于登山者登山时及他对登山可能有的情感、情绪和感情的问题时，这样的调查显然就很困难。我明白了，这种表达是一个聪明人不能、不应该询问的私事。当《登山的体验》（米切尔，1983）相继出版后，受到了登山者群体的尖锐批评，特别是那些关于登山者动机和情感的讨论。一位读者称我为“伪君子”，另一位称我为“间谍”。

知情的非共鸣角色（The Informed-Unsympathetic Role）

要理解这种角色，把隐蔽的研究者同浪漫的“间谍”的概念区别开是很重要的。完全暴露的反面被描述为“深藏不露”的隐蔽研究（范因，1980，第124—125页；庞奇，1986，第72页）。一些人认为在调查中，研究对象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被人研究，“研究者的位置实质上等同于聪明的秘密间谍”。实质上？也许，但在功能上。从理解的观点来看，间谍和隐蔽的田野研究有五个本质差别：

（a）间谍活动预设了思想认识，而研究则没有。间谍探求加深其思想认识；研究者努力理解研究对象的信仰体系和世界观。

（b）间谍活动是目的确定的使命，由于时间和环境的限制，仅着眼于达到特定的工具性目的，或者在长期内着眼于获得特定的有用信息。研究是全局性的、连续的，以对研究对象通过行动明显展现出来的意义和行动的全面了解为目的。

（c）间谍假定其在道德上优于他们的研究对象。的确，间谍活动被认为是必要的，因为用这种方法不可能完全控制“不道德的”机构和制度。研究者不将此作为定论，而是一贯敏感地感觉到他们的价值观念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研究对象。

（d）间谍的工作得到制度化的支持。间谍有中间人和应急联络员作后盾、提供背景信息，接受资料识别和收集的培训，并且有人为他们提供角色转换所必需的装备、文件、服装、语言训练、文化指导。田野工作者通常独自工作，并且没有接受过隐蔽性调查的专门训练，尽管定性方法课程一直在增加。

（e）间谍通常有费用帐户。大多数的田野工作者都是独自负担自己的研究或是将之合并到其他的有偿工作中去。

*掩饰身份的神话。*在类似间谍的隐蔽研究者的形象背后，有一个掩饰身份的神话、一种信念，即相信只有有技巧就可以从警觉的陌生人中不被发觉地通过，仅仅用几种关键的化妆手法就可以躲避侦查。在电影里，邦德或波加特穿上礼服或战地服，带上帽子，把四角帽和手枪塞进肩上的手枪套里，就完成了化妆，然后小心翼翼地混进阴谋的世界。在这里，他们两人都是在预先安排好的剧情到来时未被注意地通过的。

公开身份是化装出来的这种观点是这些冒险故事（和许多广告）的基础。它创造出了好的电影和差劲的社会学。在电影中，所有文化服饰——通过它身份得以标识——被归结为一些衣服和索引性的习语。合宜的服饰和一些有用的线索被认为足以表明精通语言、充分理解互动规则。穿上服装之后，邦德和波加特无须担心他们的口音、用词、暗语、服饰和举止是否恰当合时。而且，这些道具和行为被当作不会影响感情，仅仅是工具性的，用时即用、无用即弃。这种神话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研究者可以既是一个尽责的参与者，在现实中又是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外表与内



心是分开的。

对研究者来说，这种掩饰身份的神话有两个问题，一个简单另一个复杂。首先，研究者要冒外表上显得愚蠢的风险，就像是穿着什么也遮不住的皇帝的新衣游行，暴露出他们的无知。另外，这种神话提供了一个易令人误解的观点，即无需要面对那些研究者也许不会与之一共有其他共鸣的研究对象的情感世界。

*难题：显而易见的伪装中的信任。*在“奥罗拉山行动”行动中，我们第一个周末呆在生存主义者的准军事基地，我们极力把自己藏在服饰后面。“带上手枪”，告示上写着。这指的是“指南针、代号、巡逻，埋伏与反埋伏、侦察与巡视、夜间巡逻”。我们要求得到允许和指示。带着惊恐，借到了手枪，我们连夜驱车穿越了两个州到达聚会地——一块与外界隔绝的林中空地。早上8:30，空地上环绕着油漆斑驳的家用卡车和轮胎翻新的、跑过六位数里程的四门轿车。持枪的人——拿着口径不一的射击步枪、随身武器、手榴弹、冲锋枪——站着聊天，互相检查武器。他们穿着粗棉布迷彩服和聚酯衣服。他们的鸭舌帽和必需的宽大皮带的带扣都表明了他们对卡车和农具的品牌的忠诚。

我们是作为隐蔽的研究者到来的，希望能够混进去。我们驾驶着一辆过时的柴油货车，为这次的“伪装”在一家刚刚降价的折扣店里买了全套的狩猎装备，L.L.BEAN的裤子、巴塔哥尼亚夹克，耐克运动鞋。

埋伏演习和枪战开始了。我们学会了怎样耳语和爬行，怎样使用武器，怎样向人射击。另一件矛盾的事是：我们的伪装被当作天真的狂热的标志（还有谁会穿这样滑稽的衣服？）。我们被认可了，得到了友善的尊重，甚至是赞扬。但是我们从未被检查过。

难题：在冷静观察中的信任。“了解一件事情有两种大相径庭的方法”，伯格森（1912）说，“第一是我们靠近目标；第二是我们进到里面去。”田野工作者的挑战是探索第二种方法。

从涂尔干到戈夫曼的社会学家已经注意到了仪式在保持群体身份和整合中的地位。即使是田野研究的新手也能很快地懂得这些行动是最简单、最常规的——基本的认知记号，问候的形式和其他划分群体界线、区分成员与非成员、“我们”和“他们”的标志。这些世俗的仪式是频繁的，但又是短暂的、表面的，几乎没有实质性内容，很容易模仿。但是在其他亲密的和重要的时刻，团结一致的仪式需要更多的“你好”和“是”，握手和“嗨”这样的标记。它们需要参与。研究者必须参与到身边的事务中去，或是以相应的行动代替。了解这些内幕的研究者在肯定这些行为之外必须做得更多；他们必须投入进去。在这种关键时刻，冷静旁观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此会导致被私人活动排除出去的风险。

这是田野工作中守密的关键。伪装仅仅掩饰了外貌。无论表面的外观是哪种样子，人种学家都是无法隐藏自己的。为了进行下去，为了进入到全身心投入的亲密关系中去，研究者必须向研究对象的感情世界敞开心扉。为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共鸣，这样的参与无疑是必须的。最糟的是，这些研究者通过仔细鉴别、采取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后证明他们的发现是无效的。但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认同其研究对象的世界观。有些人发现他们的研究对象的观点与他们自己的相反，甚至是对抗的，他们的仪式是令人憎恶的。即便是这样，参与其中也保留了扩大理解和认同的场所。为了进行下去，人种学家必须肃清实证主义残余的观念——在感情虚假的伪饰的自我背后，“真正”冷静的、客观的自我可以被隐藏。研究者必须同时面对表演的自我和经验的自我——二者是冲突的，也都是真实的。这里没有冷静的观察者。

我独自一人，在离家两千英里远的地方，在信仰基督教的爱国者生存会议的第三天，自愿承



担守卫的任务。他们告诉了我许多在莫阿克生存总部巡逻所需要的安全措施，并且要我保护这 400 个与会者不受窥探和监视。

这里有武装的雅利安人和三 K 党。以理智、爱国精神和上帝的名义，他们极力批判国债、种族解放、发给小农场主的经济援助、种族灭绝。与会者讨论了这些内容：热狗、畅销商品、突击队的小刀、圣经、山羊奶粉、癌症的自然疗法。人们大致浏览一下，美元就易主了。

我们有四个人被安排在晚上看守大门。在夜色里，我们指挥着迟到者的交通，检查他们的通行证并向里面通报。露营地安顿下来了。讨论转向传统的生存主义者的话题。首先是枪，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把枪从隐蔽的枪套里取出。“我的在车里”，我撒谎说。然后由于我们大致是没有特殊目的的陌生人，我们开始讲故事，以再次确定我们的敌人、重申我们的守则。我们围着一小堆篝火站着，听着从主会场传来的遥远的祷告和演说。我们的故事是按顺时针方向进行的。站在十二点钟位置上的人谈到经常出现在他家所在社区附近的一个公共花园里的同性恋，问在“将来”应该对他们做些什么。他的建议包括锁链、绞刑架和绑在身体上的带有长保险丝的炸药。请理解这些建议，这既不是吹牛也不意味着过分的残酷，而是一个合理的提议。我们都面临着“同性恋”问题，不是吗？社会应该是“干净”的，不是吗？我们点头表示严肃的同意。站在三点钟位置上的人思考了一阵，然后提出了一个实用的关于夜晚和练习步枪的解决方法。“好主意”，我们轻声支持。站在六点钟位置上的人说到在做完兽医手术之后，他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劳动力，我们都笑了。几辆汽车通过了大门。夜越发宁静了。现在轮到站在九点钟位置上的人，也就是我，我也讲了一个故事。

在我开始讲故事时，一个新来的人加入了我们。他听完我的想法并且赞同，做了自我介绍，然后告诉我一些并非每个人都知的事，关于计划的制定，即将采取的行动。他说他们可以用象我这样的人，并且告诉我做好参加的准备。我真诚地接受了他，其他人也是如此。他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十大通缉犯”名单上的人。

假如有不带感情地参与这种活动的研究者，我不是其中之一，而且我也不希望是。我所希望的是有一天能够忘记，忘记这些清晰的声音，我自己的话，站九点钟位置上的人所讲的故事。

他或她不再远离行动、对话，而是不可避免地被牵连到其中。伯格森所说的挑战来临了。这些社会学家被列入坎姆斯的（1942/1945）的名单中：艺术家、作家、戏剧家、和其他的文化解释者，他们发现，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定义与他们定义他们的工作一样的多。最后并且最根本的是，人种学家应该明白：在意义重大的行动中，外表和内心之间是不能截然分开的。

【译文选载】

男性主导情境中的女性研究者

——短期研究与长期研究

琼·内夫·格妮 (Joan Neff Gurney)

石鑫译

关于进入田野和被当地人接受的过程已有很多著述。显然，进入研究点是每个田野调查的关

